

# 春風化雨臨西螺—日治時期西螺地區的教育推手劉煥文老師

蔡元隆\* 張淑媚\*\*

##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時期西螺地區的教育推手—劉煥文老師，在「漢民族意識」與「教育愛」的交融下轉化情感，昇華實踐「隱性抗議」的作為。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法，針對二名日治時期受教於劉煥文的學生取得口述資料，並輔以《臺灣日日新報》、《西螺鎮志》、《新修西螺鎮志》、《西螺演義》、《文昌情·教育心—慶祝創校百週年紀念特刊》等地方文獻及書籍作為研究工具。經綜合歸納與分析後發現：從劉煥文老師的案例中，確實存在著「隱性抗議」的身影，他在面對殖民的壓迫或外在的異化，能反省察覺自身的處境，並透過教學解放霸權。再者，在教學的形式與心態上，他更期待將原本象徵支配的知識傳遞方式，透過轉化，讓學生也可以進階到「發聲」階段，進而解放自己，產生反身性思考，並建立囡仔正確的知識觀與價值觀，而這個行為的背後都植基於溫暖的「教育愛」與澎湃的民族情懷。透過「教育愛」的實踐，更發展出一種疼愛臺灣囡仔的情感，經由身教與言教，無時無刻的影響臺灣囡仔，希望臺灣囡仔可以藉由教育功能進行社會流動，進而擺脫殖民霸權的宰制。最後，研究者發現在臺灣教育史上的日治殖民抗爭扉頁中，初等學校的少數臺籍教師並非無聲或缺席，他們只是透過高層次的「隱性抗議」進行抗拒，進一步展現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能動性及批判性。

**關鍵字：**日治時期西螺地區、劉煥文、教育愛、隱性抗議、轉化型知識份子

\* 第一作者：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Email：tommyorlevis@yahoo.com.tw

\*\* 第二作者：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系教授兼主任

Email：shumei1967@mail.ncyu.edu.tw

## 壹、前言

清領時期雲林縣西螺的特產—「稻米」早已聞名全臺，從日治時期起，更是聲名遠播，甚至被虎尾郡官方指定為「獻穀」、「神饌米」等至高榮耀，供奉神祇或神社專用<sup>1</sup>，也由於其品質優良，在當時一直是輸出日本內地的大宗（張素玢總編纂，2015；程見勝，2003）。除此之外，西螺更是教育人才輩出的福地；當你穿梭在西螺的大街小巷中，必定常常聽到老人家東一句「漢文老師」，西一句「煥文老師」，若非在地的西螺人，也許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漢文老師或煥文老師是何許人也？日治時期的劉煥文，任教於西螺公學校，除了「教日本書」外，更擁有高深的漢文造詣，也因為這個專長，讓在地人崇拜地將「煥文老師」與「漢文老師」直接畫上等號。除此之外，桃李滿天下的他，更是光復初期西螺地區不少政商名流的老師，所以提到漢文老師，在西螺當地可說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的「西螺三老」之一<sup>2</sup>（蘇志鴻纂修，2000）。

清光緒21年（1895）清朝對日的甲午戰爭敗北，割讓臺灣予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島內瞬間風雲變色，一夕間臺灣囝仔們高舉著太陽旗、唱著桃太郎さん搖頭晃腦的上學去，那一年劉煥文僅14歲，這一幕對他產生很大的衝擊。在日本殖民臺灣前，他學的是中華儒家的四書五經與傳統的五倫觀念，日本殖民後，對其原有漢民族意識產生極大的挑戰，但新政權的移轉讓他瞬間察覺到：身為小蝦米的老百姓們若要抗拒這隻大鯨魚，成為時代的知識份子是唯一選項，而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就該「適應」與「轉變」，這個認知促使他報考明治32年（1899）成立不久的臺中師範學校，立志成為一位老師。而這也開啟了劉煥文在西螺地區誨人不倦、作育英才的教師之路（圖1）。

劉煥文一生橫跨清領、日治兩時期，對其來說大中華的民族意識，是與生俱來的情感，但在時代統治者的更迭下，命運的捉弄使其一生必須奉獻於日治時期的教育環境（蘇志鴻纂修，2000），而劉煥文在強烈的漢民族意識下，如何調適心態蟄伏於殖民體系下作育菁莪？抑或是有其他原因？以下茲就劉煥文的生平及教育理念先行介紹，接著再針對其如何在「漢民族意識」與「教育愛」（pedagogical love）的交融下，轉化

---

<sup>1</sup> 「獻穀」係指，日治時期每年的11月舉行新嘗祭，挑選下一季的祭神稻穀，被挑選中的稻米則稱為「獻穀」；此外，「神饌米」係指，專門祭拜、供奉神祇或神社的稻米。日治時期西螺所產的米，曾被尊稱為「天皇米」，文獻曾記載西螺街的茄苳地區，在昭和7年（1932）曾被選為「獻穀」外，更於昭和16年（1941）榮獲神饌米的稱號（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月12日，1932年6月30日；張素玢總編纂，2015；邱創裕，2016）。

<sup>2</sup> 「西螺三老」分別為劉煥文、廖丞丕、廖重光（蘇志鴻纂修，2000）。

情感作為支撐「隱性抗議」(hidden protest)的信念進行相關解釋與論述，且輔以曾經受教於劉煥文的學生進行口述歷史訪談，間接了解劉煥文的想法與感受，並於文後對劉煥文的作為與貢獻進行評論。



圖 1 西螺公學校卒業式合影留念(第一排右起第 9 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收藏

## 貳、文獻探討

### 一、「隱性抗議」定義與相關研究

「隱性抗議」係指，日治時期初等學校的少數臺籍教師受到知識的啟蒙後，察覺到自身的被殖民處境，由於身份矛盾，所以僅能透過努力教學以達「隱性抗議」來抗拒日本的殖民統治。再者，日治時期初等學校的少數臺籍教師透過課堂教學、課後補習教學的途徑進行「隱性抗議」，讓臺灣囡仔能在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 中躍升至中、上階級，所以課堂教學、課後補習已不僅是教師單純展現個人能力的方式，更帶有反思後殖民地的情緒存在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4；蔡元隆、張淑媚、黃

雅芳，2013，蔡元隆、黃雅芳，2020)。

「隱性抗議」一詞的出現，是由蔡元隆（2008）在其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嘉義市公學校的思想掌控及學校生活之研究〉中率先提出，惟該論文中對「隱性抗議」的概念粗糙且解釋不明確。直到〈初探日治時期（1939-1945年）公學校臺籍教師的隱性抗議—從薪俸制度的差別待遇談起〉、〈日治時期皇民化的幫兇？—五位國民學校臺籍教師對抗殖民霸權的反省實錄〉、〈臺灣日治時期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及〈從抗拒到轉化：談日治後期嘉義市國民學校臺籍教師的臺灣意識及其教學實踐〉等四篇文章的研究歸納後，才逐步建構出「隱性抗議」的雛形（包含課堂的努力教學及課後補習兩種）（蔡元隆，2010；蔡元隆、侯相如，2008a, 2008b；蔡元隆、朱啟華，2010）。

再者，〈臺灣日治時期初等學校體罰現況初探：口述歷史研究〉乙文中，透過訪談的口述，發現有部分臺籍教師在「隱性抗議」的概念中存有「教育愛」（武裝愛）（armed love）的心理層面（蔡元隆、侯相如，2009）。最後〈日治後期（1943-1945）臺籍教師在初等學校中抗拒殖民霸權的形式分析：以嘉義地區為例〉及〈「矛」與「盾」的衝突：論日治時期初等學校臺籍教師「隱性抗議」之意涵及其在臺灣教育史上的啟示〉兩篇文章中，逐步勾勒出「隱性抗議」的動機已經從物質滿足提升到精神滿足（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3a, 2013b），並在《圖解臺灣教育史》及《讀冊真趣味：從懷舊老物件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兩本書籍中正式定義與詮釋「隱性抗議」的意涵與作為（張淑媚等人，2014；蔡元隆、黃雅芳，2020）。惟美中不足的是，上述之著作並沒有對其「行為」與太多的個案行為作更進一步的理論分析與驗證，甚為可惜，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存在「隱性抗議」的臺籍教師甚少，而導致「隱性抗議」一詞雖誕生，卻沒有充足的實際案例去補強此論理的正當性與實踐性。張淑媚等人（2014）、蔡元隆、黃雅芳（2020）雖已明確定義出「隱性抗議」意涵與作為，惟案例卻仍鳳毛麟角，無法全面支撐這個名詞的合理性與存在性。爰此，研究者希冀透過更多文獻爬梳或訪談資料整理的方式，佐證與強化「隱性抗議」的存在性。

## 二、關於西螺地區劉煥文相關之研究與文獻

目前關於劉煥文的文獻論述不多，僅有雲林縣政府出版的《西螺鎮志》有專章，第12篇（頁12-29至頁12-36）及第9篇（頁9-73至頁9-76）介紹劉煥文相關生平與事蹟，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出版的《文昌情·教育心—慶祝創校百週年紀念特刊》乙書提及學生對劉煥文的印象外（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2000；蔡元隆、黃雅芳，

2020；蘇志鴻纂修，2000），甚少有專文討論之<sup>3</sup>。

此外，日治時期關於劉煥文的文獻記載亦不多，研究者透過國立臺灣圖書館建置的「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僅檢索到二筆資料，一筆為《臺灣日日新報》新聞記載其受獎的經過<sup>4</sup>，一筆為其在《臺灣教育》雜誌上發表的文章<sup>5</sup>，且尚有《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官方記載劉煥文任職公學校職務的相關紀錄。

##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由於本研究著重在訪談者的親身經驗與受訪意願高低與否，故本研究的受訪者是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篩選，訪談具代表性、有經驗的典型對象，因為口述歷史是對歷史事件或人們對特殊回憶和生活經驗的一種紀錄，所以他們必須有經驗才能加以回憶與述說(楊祥銀，1997)。此外，口述歷史絕對有助於瞭解、澄清未曾記錄的史實及解開的謎團。國際口述歷史學界權威學者 P. Thompson (1988) 認為，口述歷史是關於人們生活的訪問與調查，包含對他們口頭故事的記錄。另一方面，口述歷史的方式可反映研究者的自省位置與被研究者聲音(voice)的歷史重構，因為它突破了傳統歷史的來源必須是取自於文字的限制，把歷史的取材與資料來源拓展至相關人們的敘述(江文瑜，1996)。以下分三個部份說明之：

### 一、研究受訪者

本研究針對二位經歷了日治時期(1931-1939年)就讀於西螺公學校的畢業校友並曾受教於劉煥文老師，作詳細的口述歷史(表1)。<sup>6</sup>

<sup>3</sup>民國 93 年(2004)及民國 105 年(2016)出版的《臺灣小學世紀風華：第一本臺灣孩子的百年校園紀事》、《大人的小學時代：一堂最有趣的臺灣史，從小孩子看大時代》，曾在介紹公學校臺籍教師時，以劉煥文老師為例說明之，但內容甚少(島嶼柿子文化館，2004；柿子文化，2016)。

<sup>4</sup>請參見昭和 8 年(1933)年 12 月 5 日於《臺灣日日新報》的第 4 版，刊登了〈祝受教育表彰〉乙篇文章(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12 月 5 日)。

<sup>5</sup>請參見大正 6 年(1917)，劉煥文於官方出版的第 183 期《臺灣教育》刊物發表了〈贈君遜先生告別〉乙篇文章(劉煥文，1917)。

<sup>6</sup>本研究所訪談之兩位西螺公學校所取得之口述資料十分不容易，第一，因為就讀過西螺公學校且曾經被劉煥文老師教過的學生至少都要 92 歲以上。第二，為了提升研究的可信度，把口述者的健康狀況與精神狀態列入基本考量，因為隨著年齡增長，在生理上(視覺、聽覺、重大的身體疾病)的損壞或記憶扭曲、失真會影響到口述的真實性，故更加深了協尋訪談對象的難度。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訪談的人除了需有親身的經歷，更重要的是能克服生理上的限制。

表 1

二位畢業校友基本介紹

姓名	性別	年齡	日治就讀期間	就讀學校名稱	科別	健康
高木枝	男	94	1931-1937 年	西螺公學校	初等科	尚可
林順昌	男	92	1933-1939 年	西螺公學校	初等科	尚可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 二、資料的蒐集

研究者將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針對二位日治時期就讀於西螺公學校並曾受教於劉煥文老師的受訪者訂訪談大綱。本研究的訪談時間經與二位訪談者協調後，每次大約為一小時至一個半小時為限。由於口述歷史訪談帶有主觀性與個案性，為盡量避免「事後的回憶」被干擾或影響，除了考量訪談者的年齡及健康狀態外，會盡量在訪談的過程中修正性、技巧性的提問訪談內容，並在打完逐字稿之後跟訪談者再次確認，或進行採用三角檢證 (triangulation) 以便相互查證，力求資料之真確性，提升成果的信度與效度。此外，透過國內已經建置的相關日治資料庫及國家圖書館，蒐集日治時期或近代的史料，如《臺灣日日新報》、《西螺鎮志》、《新修西螺鎮志》、《西螺演義》、《文昌情·教育心—慶祝創校百週年紀念特刊》等地方文獻及網際網路等有相關劉煥文老師的資料。

## 三、資料的分析

### (一) 文獻的分析

相關研究資料與口述歷史叢書的文獻部分，會將文中的口述字句作適當的編碼，並將之採以系統式的編排佐證方式融入相關的訪談內容中，並與訪談內容作前後的脈絡性連結，讓此研究能更充實與深入。並採用外部考證 (external criticism) 以確定資料的真偽或完整性；及對資料的內容進行內部考證 (internal criticism)，以確定資料內容的可靠性。

### (二) 口述歷史的分析

#### 1、逐字稿的抄謄及整體閱讀

首先將每一份訪談錄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成為日後閱讀及分析的文本。在

謄寫逐字稿前，筆者先紀錄文本編號、受訪時間及訪談地點等，謄寫時反覆聆聽錄音檔內容，一字不漏的將其轉化成文字。接著將謄寫完畢的文本列印之後，做每份文本初次的整體閱讀，秉持著客觀的角度視野、跳脫先前刻板印象及經驗詮釋，儘量融入受訪者的情境脈絡中。

## 2、進行編碼

兩位受訪者依據受訪時間編碼，例如 107 年 6 月 11 日訪談高木枝即編碼為「1070611 訪談自高木枝」。又如 108 年 1 月 11 日訪談自林順昌即編碼為「1080111 訪談自林順昌」，以此類推之。

# 肆、結果與討論

## 一、劉煥文的生平介紹及其教育理念

劉煥文（1881-1945），出生於清光緒 7 年（1881）8 月 12 日誕生於臺灣府雲林縣西螺的村庄裡，乳名「文章」，諱名「育英」（蘇志鴻纂修，2000）；明治 32 年（1899）18 歲時進入臺中師範學校就讀，於明治 35 年（1902）3 月 19 日畢業，是臺中師範學校創校以來的第一批畢業生（侯禎塘，2019）（圖 3），接著 4 月奉派任教於斗六廳他里霧公學校（現今雲林縣斗南國小）（圖 4），執教鞭兩年後，隨即申請返鄉服務，回到西螺公學校（現今雲林縣文昌國小）任教，誰知道這一待，竟在西螺公學校待了 33 年，直到昭和 11 年（1936）4 月於西螺公學校光榮退休，在教育界共計服務 35 年（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2000；蘇志鴻纂修，2000），其任教的期間表現優秀，受過不少表揚，其中最引以為傲的是昭和 2 年（1927）時，曾前往臺灣總督府教育會大典前接受州知事（類似州長職位）表揚，並一路官運亨通，官拜從七位、勳八等（蘇志鴻纂修，2000）。緊接著昭和 9 年（1934），赴日本內地受東京帝國教育會的表彰，並接受日本天皇召見，可說十分榮耀，因為此殊榮全臺僅有六個名額，雀屏中選者，皆是菁英中的菁英，<sup>7</sup>甚至由於他在學校教學態度認真，昭和 1 年（1926）時，日籍校長高橋茂雄公務繁忙，突然病倒，短期內無法勝任校長乙職綜理校務時，他更臨危受命接下代理校長乙職領導學校，直到新任校長到職（臺南州，1927；蔡元隆、黃雅芳，2020）。

<sup>7</sup>另外五位分別為：三好照藏、瀨上寅雄、廖重光、林振聲、廖學昆（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12 月 5 日；蘇志鴻纂修，2000）。

此外，「教育愛」的信念，一直是劉煥文實踐教育理想的核心。非不得已才會動手處罰學生（如不懂事、屢勸不聽話的學生等），以打手心或屁股為手段，這時候，他一定嚴格要求學生站直身體，兩腳不可分開，以免傷及學生的重要部位（蘇志鴻纂修，2000），研究指出，臺籍教師在體罰方面比較偏重生活常規，且在體罰的處理上較不會宣揚皇民思想，政治意味降低許多（蔡元隆、侯相如，2009）<sup>8</sup>。而劉煥文的想法似乎也符合上述的論述。被劉煥文教導過的高木秋回憶指出：

我是農家子弟，因為要幫忙種田，所以體力很好，也很調皮搗蛋，常常被日籍老師修理，但是漢文老師對我總是很有耐心的開導我，除非是在學校裡闖什麼大禍，他才會「真的」狠狠揍我一頓。（訪談自高木枝 1070611）

另一位劉煥文的學生廖聯圳也回憶指出：

一年級的恩師劉煥文先生，他是日據時西螺最早的「訓導」。敦厚 敦實、循循善誘，從不厲聲叱責學生；打屁股時「高高舉上，輕輕放。（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2000）（頁40）

又林順昌也不好意思的回憶指出：

我以前功課不太好，又愛調皮搗蛋，常被日籍老師打耳光跟罰站，漢文老師看到時就會過來解圍，並打圓場，很嚴肅的說：他來接手處理。轉個身，他就會「很有愛的眼神」看著我，問我做錯什麼事？並教導我正確的想法，導正我錯誤的行為。（訪談自林順昌 1080111）

由上述的三位學生們回憶內容可間接知悉，劉煥文在執行體罰上，只是要讓學生體悟「生理上的痛」並知悉犯錯的問題所在，而非在心理上灌輸皇民思想的動機。這

---

<sup>8</sup>蔡元隆、侯相如（2009）在研究中指出，當時初等教育的老師認為教好孩子是他們神聖的事業，要型塑臺灣囡仔成為一個有文化的日本皇民，並達到修身科所講的「四大綱要」：國家精神涵養、順從、誠實、勤勞。不過從日籍老師的體罰行為中已隱約透露出，他們希望將臺灣囡仔馴化為一個皇民赤子的心態，已經突顯了皇民化的軍國主義傾向。



極有可能是他自身察覺到被殖民的處境，而特別發展出另一種疼愛臺灣囡仔的情感，而這種「教育愛」的核心其實是帶著「武裝愛」的抗拒性，讓劉煥文藉由教育的場域，使用一種虛偽化的語言遊走在剃刀邊緣，為了生存……等等相關因素而不去觸犯這樣的底限，表面上會刻意的去遵守宰制者所訂下的規範（蔡元隆等人，2013），但實際上卻不時地掩護臺灣囡仔，而這般的作為正是實踐「隱性抗議」的精神。也由於劉煥文深受孩子們喜愛，所以也常被學校委以重任，擔任教導低年級的要務<sup>9</sup>，由於日治初期公學校的新教育制度較不被臺灣坊間的家長認同，加上當時家庭對子女的教育亦不重視，所以當時的老師為了招生，都要親自下鄉，而劉煥文則成為了西螺公學校的招生王牌，家長都會問是「漢文老師」（煥文老師）要教的嗎？是的話，才肯送孩子入學。林順昌回憶著說：「我當初能到公學校唸書，就是爸爸衝著漢文老師的面子讓我去唸的」（訪談自林順昌 1080111）。高木秋接著說：

老師告訴我們，我們是中國人（漢民族），雖然被日本統治，但是讀書是唯一可以改變未來的機會，要我們好好讀書，很鼓勵我們繼續讀書。所以老師也很努力教導我們，我也很努力讀書，他退休的隔年我就考上高等科，我爸媽非常高興，很感謝漢文師仔。（訪談自高木枝 1070910）

由此可見，劉煥文在家長與學生間的好人緣，而這也推展了劉煥文用深厚的人際關係合法掩護「武裝愛」的作為，讓其在對抗日本霸權下，可以合理的運用教學專業來營造師生之良好互動。

劉煥文當時在學校也教授「漢文科」<sup>10</sup>，所以鄉親常把漢文跟煥文的名字畫上等號，而他的漢文造詣也是深藏不露，例如：他曾寫過一首漢文詩送給一位要離別的同事，題為：〈贈君遜先生告別〉，品學精純夙所欽，栽培桃李綠成陰，而今退隱林泉去，幸有佳兒嗣厥音（劉煥文，1927）（頁9）。從文中的用字遣詞，看的出來他的漢文底子深厚，文學造詣深湛。被尊稱漢文老師，可說是實至名歸。林順昌回憶著說：

因為當時日籍老師也要會一點漢文（臺語），所以日籍老師常會去跟漢文師

<sup>9</sup>早期臺籍教師幾乎僅能擔任低年級教師或教授漢文課程（吳文星 1983；蔡元隆、朱啟華，2010）。

<sup>10</sup>早期師範生中有不少已具有相當的漢學基礎，所以師範生擔任教職後變相取代傳統舊仕紳擔任公學校的漢文課程（吳文星，1983；蔡元隆、朱啟華，2010）。

仔請教，他一點都不會驕傲，而是更謙虛的教導對方，並有問必答。(訪談自林順昌 1080111)

高木秋更接著說：

漢文師仔上課時，常常出口成章，一口流利的漢文詩詞，聽的我們暈頭轉向，但是他是肚子裡有真材實料的師仔，他唸漢文時抑揚頓挫的語調，至今我都餘音繚繞。(訪談自高木枝 1070910)

劉煥文的漢文造詣，除可從其精闢到位的用字遣詞，領略他深厚的文學底蘊外，更間接影響到學生在校園中觀察劉煥文與日籍教師互動的校園印記，這無疑都是對劉煥文最深切的肯定與師生間最美好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不然不會事隔八十多年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此外，研究者認為劉煥文對漢文語言的熟稔與重視，也在在反映了他眼中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必要性。因為在普世大眾的觀念中，族群或國族的構成要素多半以歷史、集體記憶、價值觀、語言、傳統習俗、衣著方式、生活型態及飲食等，然而其中又以語言最被認為是國族的必要條件之一(施正鋒, 1998；蔡芬芳, 2008)，而語言則關係到教育政策的實施，教育政策又涉及政治議題運作，所以在語言、教育及政治中，形成一種彼此相互幫襯的依存關係。劉煥文在實務的教學現場中可能也漸漸體悟到，語言對國族認同的影響與重要性。

## 二、民族意識基底：實踐「教育愛」

日治時期的老師與醫師，一直以為被認為是臺灣菁英的兩大出路。在地方社會中，受新式教育、回到地方上擔任公學校老師者，經常是地方社會的中心人物，他們一方面擔任教育工作，有時也幫臺灣總督府宣傳政令，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算是遂行統治的工具性存在；另一方面，他們是新知識、新文明的體現者，甚至也藉其知識為民眾爭取權益，因而受到信賴與尊敬(許佩賢, 2013)。漢文化儒學的傳統從古至今就為書院、書房、學校教師塑造出教師的權威圖像，這種道德規範由來已久，特別是以身作則的典範，教師亦屬天地君親師之「五恩」之一，理應作為圭臬以供學生仿效與敬仰，世俗間對於公學校教師也會存有同樣的意象，甚至用更高的標準檢視之。

研究霸權主義的義大利後現代社會學家 A. Gramsci 指出：教師是國家塑造的知識

傳遞者，且是精神國防的尖兵，所以他們常被賦予傳遞霸權知識份子的表徵（引自黃嘉雄，1996），再加上老師們往往也將自己定位為確實執行上級命令的公務員，被認定擁有濃厚的「官方意識」（許誌庭，2002）。且老師早期被視為軍人擬像表徵，他們必須重視品德、操守與思想的教育，因為他們代表著精神國防的一環（翁福元，1996），使教師往往被要求有較高的政策服從性，以便符應統治階級傳播合於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所以在這種特殊身份下，也讓日治時期的臺籍教師背負著國防精神的任務，更造就了他們當時特殊的身份（張淑媚等人，2013a），但在美國批判教育學家 P. Freire 眼中，認為身為教育者（教師），既是藝術家，也是政治家，他們從來就不是技術人員（Freire, 1998a），意味著教師應該有覺察能力與反省能力，因為在這環境中能改變的主導者也只有教師，因為儘管資本社會賦予中上階級制定課程內容的權限，但其執行過程卻需仰賴教師，同時教師也享有高度的教學自主權（蔡元隆，2008；蔡元隆等人，2013）。

而劉煥文的精神正符應了上述 P. Freire 的信念，他不甘於此，其雖然受殖民政府教育的培養並任職於殖民政府下的教育制度，但是他對殖民政府的制度亦有所不滿（例如：日籍教師有六成的加俸、日籍教師常歧視或刁難臺灣學生），加上在殖民體制內身分的敏感，老師難以違背國家教育體制和文官體制，但為表現自身對民族意識的責任，所以他選擇避免與殖民政府直接衝突，改以透過認真教書，白天在學校用日語教學，並幫想要繼續升學的囡仔免費補習，而課餘時間則到書房教導鄉民學習漢文，這種「明教日語，暗授漢文」的行為，一直沒被臺灣總督府發現（柿子文化，2016；島嶼柿子文化館，2004，蔡元隆、侯相如，2008a；蔡元隆、黃雅芳，2020）。高木秋回憶著說：

漢文師仔白天在學校時，課堂上他也常常發表批評日本政府對臺灣人的不公言論，但當校長來巡堂時，他總是有辦法把上課內容轉回來，「一語雙關」，繼續講課，非常厲害。校長聽到了還頻頻點頭認同。（訪談自高木枝 1070611）

又林順昌說：

漢文師仔對我影響很大，有時候上課課本裡的內容，太過歌功頌德日本，他就會開始反駁，並提出我們臺灣人不亞於日本人，千萬不要妄自菲薄，更要

與日本人一較高下。(訪談自林順昌 1080111)

由此可知劉煥文透過較高手段的「隱性抗議」(努力教書),解放臺灣囡仔的「知識觀」(epistemological views)並重建屬於臺灣囡仔的「認同性」(identity),最終目的是試圖透過「教學」來解放日本霸權對囡仔們的宰制。而劉煥文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心之所趨的心態,也呼應了大正 15 年(1926)3 月 21 日登載於《臺灣民報》的乙篇論評〈教師對政治上的責任〉,提及:

最後我們要希望公學校教員或中學師範以上的臺人教員,民眾的無智,雖然是歸於官僚政制的弊害,但直接有擔負國民教化的重任的教員,是不能默默看過的,雖然是大部分因為環境所壓服,不能多展其抱負,然在我們的活動可能的範圍內,是不能被人壓服的,要本我們的良心去做事,我們纔無愧為人類的一分子。(臺灣民報,1926年3月21日)(頁2-3)

評論者的文章,深中肯綮的提醒新時代中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教師,應當對社會、國家的使命感有所覺察與敏銳。因學校具有「政治—教育」的霸權功能,統治者可將統治意識型態轉化為教育內涵,接著透過教育使學生成為霸權的實踐,建構霸權統治的領域。而且,學校是再製知識份子並再製宰制支配權力的機構,任何一個霸權的建立,或是爭取霸權的過程,都必須掌握學校,教育群眾,建立新的意識型態(譚光鼎,2000),所以教育與政治的關聯性息息相關的。緊接著劉煥文的長媳莊葡萄也回憶指出:

雖然劉煥文在日治時期擔任教育者的工作長達 30 多年,然而其對中國民族思想的情懷與文化熱情,頗為深厚,因此講日語的行為對其而言,只不過是外族統治下,所必備謀生的工具之一。(蘇志鴻纂修,2000)(頁 12-30)

從上述的觀點可窺知,劉煥文的漢民族意識立場堅定,而內容中提及的「中國民族思想」,並非現在的大中國思想文化,而是帶著傳統儒學的漢文化思想,更精確的詮釋,他認為臺灣人的血緣、文化與中國同出一源,是漢民族到臺灣打拼的渡民,而臺灣只是清朝戰敗割讓給日本統治的殖民地,骨子裡我們還是漢民族,由此可知劉煥文「漢人魂」之強韌。

再者，從劉煥文家中面對日本政權的「陽奉陰違」的作法更堅定他對漢民族意識的國族認同，昭和6-9年（1931-1934）間尚未全面實施皇民化政策，而劉煥文身為公學校教師被要求以身作法「改日本姓名」跟「申請國語家庭」，惟劉煥文不為所動，拒改日本姓名，但由於身處地位的尷尬，被迫消極的成為了「國語常用家庭」的一員，而那塊銅牌從申請、取得到他離世，一直塵封在他書桌抽屜內，未曾掛在門前過，因為他曾向子女說：「無此必要，臺灣人講臺語是理所當然。」（蘇志鴻纂修，2000）（頁12-30）

上述的舉動與言論，驗證 P. Freire 認為意識覺醒能使人們看到問題與衝突，唯有透過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才不會曲解對社會實在的認知，並能反思自我的責任，成為恢復自我人性的主體（Freire, 1973），征服者可以消滅一個民族的所有人，但是無法消滅那個民族的意識，明確的表現出當年劉煥文自詡為知識份子對國家認同的表現與行為（蘇志鴻纂修，2000）。此作為凸顯了劉煥文「不忘本」的「漢人魂」，也彰顯了「隱性抗議」在劉煥文身上的實踐作為。

除此之外，在教學上，劉煥文常常在課堂上教授中國的文化、藝術、歷史給學生聽，展現出他對中華祖國文化的欽慕與嚮往（蘇志鴻纂修，2000）。高木秋帶著感激的心回憶著說：

我二年級時被「漢文老師」教過國語（日語），因為那時候日語不太會講，所以上課時老師怕我們太小聽不懂，都是日語與臺語夾雜者講課。不只是單純的講課，還會教我們反省整篇課文背後的意義，受益非常良多。（訪談自高木枝 1070910）

又林順昌也意有所指的回憶說：

漢文師仔說臺灣囡仔要知道臺灣事（中國傳統漢文化），學漢文是最佳途徑，他常常叫我晚上有空就去他們家學漢文，說可以增長學問跟學習做人道理，還有可以知道自己的「角色」（國家認同），所以千萬不可以忘本。（訪談自林順昌 1080211）

進入日本殖民時期，儘管它帶來了現代化的教育體系，但教育卻成為滿足政治意

圖的教化工具，教師面臨更制式化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課程與教材（姜添輝，2002），

而 P. Freire 認為在對話的教學歷程中，認知的對象或認知內容不是教師的私有財產，而是共同反省的對象（Freire, 1970），教學自主的實踐，來自教師們自我本體的批判與反思，劉煥文在課堂上的教課方式，可以說是帶領著學生們透過殖民的框架去比較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差異性，這之間的知識反饋其實是潛藏著反省性，因為對臺籍教師而言，關起教室門後，教師享有高度的教學自主權，而這些行為都是「隱性抗議」基本的精神。德國批判教育學者 W. Klafki 直指透過部分政治意識型態的課程，可以讓學生知悉社會中的權力運作以及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提供學生反省，並尋求自我解放，以及幫助社會他人也得到解放的機會（朱啟華，2013），這種課程意識背後的意義在於啟迪學生並讓他們體悟壓迫的存在。換言之，教師專業自主權是教師角色的關鍵（謝瑞智，1996），臺籍教師透過不斷的反省與轉化，避免淪為國家機器的執行者並聽命掌權者持續維持現狀，且知覺本身就是特殊階級的一部分，促使自己無時無刻維持民族意識的清醒，所以除了以「武裝愛」來抗拒日本的歧視與霸權的宰割，他們還可能遊走在剃刀邊緣，透過語言使用及教學轉化來對抗霸權以突顯「隱性抗議」的作為（蔡元隆，2008）。

而不管在教學或與學生相處間，家長或學生對劉煥文的評價幾乎是滿分，甚至傳出，「煥文出門去調解，萬事圓滿都解決」（訪談自高木枝1070910）順口溜。且從劉煥文的長媳莊葡萄的回憶也驗證了劉煥文老師的作為：

先翁（指劉煥文老師）都擔任教低年級的學生，他的性情忠厚慈祥，對待低年級的學生溫柔愛護，懂得小孩子的心理，家長們放心讓幼兒來念書，偶爾學生與學校之間發生了什麼問題時，先翁一出去調解，萬事都圓滿解決，所以家長們對先翁很信任。（蘇志鴻纂修，2000）（頁12-30）

然而或許大家會好奇？劉煥文擁有「不忘本」的「漢人魂」為何還能忍受日本霸權對臺灣人民的剝削與歧視呢？P. Freire 在《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致有勇氣從事教學者》（Teacher as cultural works: Letter to those who dare teach）乙書中，認為老師作為一個批判的文化工作者必須擁有的特質：謙讓、愛、勇氣、容忍、果斷與安全、沒有耐心的耐心等的表現（Freire, 1998b）。而將此特質的框架檢視於劉煥文的人格特質與行

事作風，可說是全面呼應與實踐 P. Freire 的主張。劉煥文帶著謙讓的心面對家長、學生、學校，甚至是殖民政權，而身為時代的新知識份子，他以民族意識賦予的勇氣與自信，在容忍殖民霸權宰制下作遊走邊緣的抗拒，並適時的陽奉陰違抵制之，且一路走來，秉持著「教育愛」的教育理念春風化雨，讓自己在沒有耐心的耐心裡堅持著，等待適當時機，面對最佳的成熟時刻時亦能勇於實踐愛國民族意識，這無疑就是「隱性抗議」行為的最好表現。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貫穿整個核心的主要信念就是「教育愛」，理由很簡單，因為在上段論述中，研究者曾介紹他的教育理念—「教育愛」，但這個「愛」的屬性，研究者認為是一種帶有對抗性的愛，亦簡稱為「武裝愛」，這種愛的角色，像螺絲釘一樣支撐起整個民族情懷，它可以使教師可在令人困窘的報酬和專斷對待的不正義或政府的羞辱中存活下來，且仍能獻身於他們的學生（蔡元隆，2008；蔡元隆等人，2013）。上述作為的教師圖像也間接呼應了 P. Freire《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致有勇氣從事教學者》乙書的核心論述，他認為沒有愛心將使得教育失去意義，愛心不僅是面對學生，同時也是面對教學的歷程。愛必須是武裝的，否則很難克服不正義或政策羞辱；教師具備「武裝愛」才能爭取應有的權利和負起該盡的責任。而在《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致有勇氣從事教學者》乙書提及的「教育愛」或「武裝愛」的信念強化則是來源自 P. Freire 在《受壓迫者的批判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乙書中提及的「教育愛」或「武裝愛」在教學中所必要的勇氣與智慧實踐的再延續。

## 伍、結論

回顧日治時期的抗爭運動史，楊逵、張文環、鍾理和、楊肇嘉等作家與林獻堂、蔣渭水等民族鬥士，皆以其個人的犧牲奉獻在民主運動的扉頁上留下紀錄，他們憑藉著拋頭顱灑熱血的情懷，奮力對抗日本殖民的不公，但在這些前仆後繼的烈士寫下一頁頁抗日歷史時，扮演傳遞知識重要角色的臺籍教師也正用自己的方式在歷史上尋求定位；當對抗日英雄歌功頌德時，臺籍教師鮮少會被提及，因為在國家機器概念中，只要提到文化及意識型態的塑造，往往都會與教育宰制作相關連結，而教師也被連帶認為是傳遞意識型態的幫兇，因學生在學校文化中無從察覺自身的處境（蔡元隆，2008）。洵然，日治時期公學校的臺籍教師並非無聲或缺席，他們只是透過高層次的「隱

性抗議」進行抗拒，在當時已扮演著具有能動性與批判性的轉化型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sup>11</sup>，在面對殖民的壓迫或外在的異化，能敏感的察覺自身處境，並透過教學解放霸權，以導正囡仔正確的知識觀與價值觀，而這個行為的背後都植基於，臺籍教師面對殖民統治所發展出的「武裝愛」及昇華的民族情懷。劉煥文本身透過自己對「教育愛」的實踐，也發展出一種疼愛臺灣囡仔的特殊情感，並以身教和言教無時無刻的影響著臺灣囡仔，希望可以幫助他們藉由教育功能進行社會流動，而擺脫殖民霸權的宰制，在其教學的形式與心態上，更期待將原本象徵支配的「知識傳遞」方式，透過「知識轉化」，讓學生也可以進階到「發聲」階段，進而解放自己，產生反身性思考，才不至於演奏出 F. Fanon 在《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乙書中所提及的，被殖民者最深沉的痛楚之歌。

反觀在民主自由普及的今日，除去殖民時期民族意識的包袱，少了愛國情操的激勵與抵抗外敵的壓力後，擁有高度教學自由權的現代教師，其所肩負的時代任務已與過往截然不同，在時代的巨變下，現代教師少了國家宰制的政治包袱，卻多了社會文化關注的壓力，以往與殖民政府暗地抗衡所衍生出來的教學動能，如今已失去動力來源，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社會高標準的放大鏡檢視，與高規格的教學品質要求，學童也從受教師牽引的被動角色，轉變成能與教師平等對話的高度自主學習者，面對這番從裡到外的角色定位質變，教師如何維持高度教學熱忱與使命感，自我鞭策，精益求精，付出如同煥文老師當年那種無私的教育愛，進而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與確保學生的學習成就，甚至能與學生、家長搭建起如同殖民時代下那樣沆瀣一氣、同舟共濟的革命情感，互相扶持成長，更值得現今的教育人員深思！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份

---

<sup>11</sup>「轉化型知識份子」由 H.Giroux 所提出，其詞彙是修正 A.Gramsci 的知識份子概念而來，係指教師可以察覺到學校教育的複雜性與政治性，並知悉學校教育是權力關係鬥爭的政治場所，所以必須重視學生批判反省與批判行動的作為，以協助學生對抗文化霸權的宰制，以便未來的學生能批判不當的社會假定與不正義的社會制度（張盈堃，2000）。



- 江文瑜（1996）。**口述史學**。載於胡幼惠（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案例**（頁 249-269）。臺北：巨流。
- 朱啟華（2013）。臺灣國際教育的反思—以《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為例。**嘉大教育研究學刊**，**30**，1-20。
- 吳文星（1983）。**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邱創裕（2016）。「天皇米」之說的生成與再現。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北。
- 侯禎塘主編（2019）。**永續與超越—中教大雙甲子紀念專刊**。臺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姜添輝（2002）。九年一貫課程政策影響教師專業自主權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48(2)**，157-198。
-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
- 柿子文化（2016）。**大人的小學時代：一堂最有趣的臺灣史，從小孩子看大時代**。臺北：柿子文化。
- 島嶼柿子文化館（2004）。**臺灣小學世紀風華：第一本臺灣孩子的百年校園紀事**。臺北：柿子文化。
- 翁福元（1996）。**九〇年代初期臺灣師資培育制度的反省：結構與政策的對話**。載於中華民國教育學會等（主編），**師資培育應具備的新課題**(1-24)。臺北：師大。
- 張盈堃（2000）。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教育實踐。**教育與社會研究**，**1**，25-58。
- 張素玢總編纂（2015）。**新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
-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3a）。〈「矛」與「盾」的衝突：論日治時期初等學校臺籍教師「隱性抗議」之意涵及其在臺灣教育史上的啟示。**中等教育季刊**，**62(2)**，61-772。
-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3b）。日治後期（1943-1945）臺籍教師在初等學校中抗拒殖民霸權的形式分析：以嘉義地區為例。**南臺灣研究**，**2**，143-167。
-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4）。**圖解臺灣教育史**。臺北：五南。
- 許佩賢（2013）。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地方青年教師的「發達之路」及其限制—以張式毅的軌跡為中心。**新史學**，**24(3)**，135-183。
- 許誌庭（2002）。教師做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限制與實踐方向。**教育研究集刊**，

48(4), 27-52。

程見勝(2003)。**西螺演義**。雲林：雲林縣文化局。

雲林縣西螺鎮文昌國民小學(2000)。**文昌情·教育心—慶祝創校百週年紀念特刊**。雲林：作者。

黃嘉雄(1996)。**轉化社會結構的課程理論：課程社會學的觀點**。臺北：師大師苑。

楊祥銀(1997)。**口述史學**。臺北：揚智。

蔡元隆(2008)。**日治時期嘉義市公學校的思想掌控及學校生活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研究所，嘉義。

蔡元隆(2010)。**從抗拒到轉化：談日治後期嘉義市國民學校臺籍教師的臺灣意識及其教學實踐**。**文化研究月報**，101，98-101。。

蔡元隆、朱啟華(2010)。**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課後補習經驗初探**。**嘉大教育研究學刊**，25，95-117。

蔡元隆、侯相如(2008)。**初探日治時期(1939-1945年)公學校臺籍教師的隱性抗議—從薪俸制度的差別待遇談起**。**人文研究期刊**，4，75-94。

蔡元隆、侯相如(2009)。**日治時期臺灣初等學校體罰現況初探：口述歷史研究**。**中等教育季刊**，60(1)，2-16。

蔡元隆、張淑媚、黃雅芳(2013)。**日治時期臺灣的初等教育：校園生活、補習文化、體罰、校園欺凌及抗拒殖民形式**。臺北：五南。

蔡元隆、黃雅芳(2020)。**讀冊真趣味：從懷舊老物件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臺北：秀威。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42，110-121。

謝瑞智(1996)。**教育法學**。臺北：文笙。

譚光鼎(2000)。**國家霸權與政治社會化之探討—以「認識臺灣」課程為例**。**教育研究集刊**，45，113-137。

蘇志鴻纂修(2000)。**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

## 外文部分

- Freire, P. (1970) .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London: Penguin Press.
- Freire, P. (1973) . *Education for critical consciousness*. NY: Continuum Press.
- Freire, P. (1998a) . *Teacher as cultural works: Letter to those who dare teach*. Trans. By Macedo, D. ,Koile, D. &Oliveira, A. Oxford: Westview.
- Freire, P. (1998b) . *Paulo Freire: A dialogue with C. A. Torres*. In C. A. Torres (Ed.), *Education, power and personal biography: Dialogue with critical educators*. NY : Routledge Press.
- Thompson, P.(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臺南州 (1917) 。**臺南州報 31 號** 。臺南：臺南州。
- 臺灣日日新報 (1932 年 1 月 12 日) 。**今年の獻穀田 / 畑臺南州下に決定** 。3 版。
- 臺灣日日新報 (1932 年 6 月 30 日) 。**虎尾獻穀 / 田拔穗祭 / 二日執行** 。3 版。
- 臺灣日日新報 (1933 年 12 月 5 日) 。**祝受教育表彰** 。4 版。
- 臺灣民報 (1926 年 3 月 21 日) 。教師對政治上的責任。**臺灣民報** , 97 , 2-3 。
- 劉煥文 (1917) 。贈君遴先生告別。**臺灣教育** , 183 , 9 。

# **Mr. Liu, Huan-Wen, a Teacher and Promoter in Education in Xiluo Are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aron Tsai\* Shu-Mei Chang\*\*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story of a teacher, Mr. Liu, Huan-Wen (referred as Mr. Liu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Being a teacher, Mr. Liu was impacted by the compass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edagogical love. He then sublimed his education ideal by a kind of teaching, “hidden protest.” The study adopts the oral history of two students who were taught by Mr. Liu. Moreover,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references under close examination including “Taiwan Daily News,” “Xiluo Zhen Zhi,” “Xiluo Zhen Zhi(the new version),” “Xiluo Yan Yi” and “Love of Wen Chang and Heart of Education-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chool.”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nduction, from Mr. Liu’s case, the hidden protest was indeed existed. While he faced the oppression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or alienation, he could still reflect upon himself under the situation; and he emancipated his students from hegemony in his teaching. Mr. Liu especially transformed his teaching from lecturing hegemony to criticizing. Furthermore, his expectation to students was to speak out and free them from the oppression, and from this process, they did self-reflection, and rebuild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This was motivated by Mr. Liu's pedagogical love and rich feelings of national sentiment. Through his modeling, he practiced Pedagogical love and developed a certain kind of teaching ideal, “hidden protest,” to influence Taiwanese students, and hopefully, they could emancipate Japanese hegemony and achieve social mobility by

education.

Eventually, the story of Mr. Liu helped us understand that in the history of protest against Japanese colony, Taiwanes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was not absent from the scene. They were there, but they put their position low, using a different way, hidden protest, to show their anti-colony. The hidden protest is no doubt a higher level of rebellion against oppression and a representative of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with a sense of agency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 Xiluo are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u, huan-wen, Pedagogical love, Hidden protest,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 1<sup>st</sup>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tommyorlevis@gmail.com

\*\* 2<sup>nd</sup> : Professor/ Chairm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春風化雨臨西螺—日治時期西螺地區的教育推手劉煥文老師